

少数民族“80 后文学”比较论

李长中

内容提要：“80 后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已引起学界重视。在已有的研究中，学界较多关注 80 后文学与其他代际文学间的“断裂”或“对立”，强调 80 后文学的私人化表述与亚文化特征。比较而论，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因其与传统、宗教、民族、文化等问题的相互缠绕而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在融入现代性叙事的同时，更多表现为“寓言”意义上的公共性特质。不过，作为边缘存在的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的书写特征、审美趣味与价值观念等，却被遮蔽在主流文学话语规约之内，影响到当代中国 80 后文学多元性特征的敞亮。

关键词：80 后文学 少数民族 公共性 比较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新维度，代际研究为观照中国文学的多源与多维特征设置了讨论的问题域，“80 后文学”研究的风生水起即是这一研究范式昌盛的显在表征（尽管也一再遭到质疑或反驳）。在学界看来，80 后作家因其更多地与市场经济、商品消费逻辑、网络新媒体等后现代文化景观相关而使他们的生活体验、情感体验、知识积淀、成长记忆等不同于其他代际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因此被看作是青年亚文化的产物，吴义勤甚至将之称为“叛逆性、奇幻性写作”，“80 后一代叛逆性，奇幻性的理想书写，融消费文化与时尚气息于一体的市场化书写”，“以决绝的方式，抛弃了所有传统的写作规范，他们将青年亚文化视为自我独立而自由的法宝，以强烈的否定性写作，彰显自身的主体意识。”^①上述观点（立场）成为当前学界观照这一代际文学的基本视域。在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规定性面前，学界在普遍关注时间层面的 1980 年代出生的作家的文学基本特性时，却忽视了中国语境内空间层面多民族身份作家的复杂性构成，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及其文学被遮蔽在主流文学批评话语规约之内，进而成为研究的盲点。

考察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的地方性知识及民族性特征，首先需考察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的身份/文化意识与其创作间的内在勾连。与汉族 80 后作家不同，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的民

^① 吴义勤：《代际差异的凸现与文化的多元化》，《文艺争鸣》2013 年第 8 期。

族身份、民族记忆、宗教信仰、边缘体验等作为一种“深层结构”潜在规约着他们的文学创作,使得他们的文学书写很容易延伸到对民族历史、族群命运、文化身份、底层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性问题的探幽发微。尽管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大多生活在城市或有长期的城市生活经验,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和现代文明洗礼,但他们的民族出身、族群认同等仍潜在规约着他们的文学创作,使之在文学的精神底色、价值认同、身份意识等方面凸显出自身的民族性特征。达斡尔族 80 后作家晶达曾说,虽然自己的写作没有刻意写民族题材的东西,但看过的人还是能从中感受到我骨子里的民族性,它们在我的文字中不经意地就流露出来了。^①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这种自觉为民族立言且具现代意识的创作旨归,使得其文学以典型的民族性特征参与着公共性问题的言说,参与着中华多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建构。

“断裂”/“返回”中的历史记忆

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的最凸显特性就是与全球化与现代性进程一道成长。全球化趋势的日渐加剧,严重破坏了边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生态平衡,被少数民族群体认为是根基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功能遭受零散化、平面化商品经济逻辑的侵蚀而日趋与传统渐行渐远。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尽管年龄尚小、生活经验及生命体验尚显薄弱,但因自身的民族身份、宗教信仰、传统因袭等而使他们与传统有着更多情感上的牵系和依恋,心理上的皈依和救赎,民族身份问题仍使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一种“在而不属于”意义上的边缘化体验,他们既无法抵御全球化的全方位冲击或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本身,也难以再栖居于单一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由此而生成的彷徨与焦虑情绪普遍弥漫于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深处。蒙古族诗人原散羊在《内蒙古病人》中甚至将他们的生存状态概括为“内蒙古已经病入膏肓”^②。在诗人看来,蒙古族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和英雄辈出的民族。只不过英雄祖先的血性与雄性基因以及产生这一基因的传统却在现代性快速推进中不断退化。^③……既然现实已经“病入膏肓”,与历史/传统的“断裂”就成为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审美意象的主体症候。

蒙古族 80 后作家陈萨日娜的《哈达图山》无疑是这一问题的隐喻化书写。主人公老人萨姆嘎临死之前固执地让儿子把“家谱”修好,把家里的佛像“找到可以依靠的人”。然而,被她视为神圣的“祖先的家谱”在孙子眼里却“根本就不值一提,写什么呀?丢死人。”^④“老人”作为

① 晶达:《我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散发“正能量”的人》,《中国民族》2013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原散羊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727530100hacm.html。

③ 转引自卢山、赵卫峰《出自灵魂孤独的声音——新世纪以来 80 后少数民族诗人诗歌流域图》,《中国诗人》2013 年第 4 卷。

④ 陈萨日娜:《哈达图山》,《民族文学》2012 年第 8 期。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民族身份的维系者,只有“老人”才保持着对民族历史/传统的信奉,掌握着民族古老的伦理信仰与宗教习俗,通晓本民族的前世与今生。“奶奶”与“孙子”之间对民族历史的不同态度或选择路径不就是与传统断裂的隐喻吗?这一点若与乌热尔图写于三十多年前的《老人与鹿》加以比较,《哈达图山》所揭示的“传统—现代”的冲突更令人忧心忡忡。在《老人与鹿》中,“老人”始终以“记住”作为每句话的起点来强化“孩子”的认同意识,显示着当时的“老人”还有能力对下一代进行“启蒙教育”:^①“记住:这是鹿崽的声音。记住:这是狍崽的声音。记住:这是犴崽的声音。”^②经过短短三十多年的现代性发展历程,《哈达图山》里的“老人”及其所代表的民族历史/传统却被“孙子”嘲弄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现代性创伤成为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极力倡导“返回”的根源所在,并使之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寻根意义上的乡愁冲动。

在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看来,少数民族文化较之现代性文化仍处于弱势状态,现代性及全球化的纵深播撒导致少数民族文化的消解或崩溃将成难以规避的风险。一个民族文化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民族群体记忆或文化身份的消失。这种触及灵魂的身份归属不能不使他们以一种重塑文化身份的担当意识来思索本民族“何去何从”的问题,“返回”到历史/传统中寻求建构族群意识,支撑族群发展的民族精神或文化资本成了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集体诉求。蒙古族作家查黑尔·特木日的《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描写了以呼楚图为首的几个 80 后大学生,自觉保护作为“蒙古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的象征物——“箱子”,“感觉到抱在怀里的箱子是那么的沉重,如山般地沉重。”^③80 后一代对民族历史文物的敬畏与尊重、维护与传承,其实就是为了唤醒族群记忆,凝聚族群意识,想象族群共同体,同时也是延续民族传统,维系民族记忆的一种方法;蒙古族作家周静的《往事飘过河流》也是通过对祖先迁徙历程的深情缅怀而触摸民族历史根性,以达到唤醒族群记忆的目的^④。土家族作家杜李的《鄂西,鄂西》以土家人迁徙历史的一再缅怀作为重建现代性语境下民族认同的精神背靠。正是在对民族历史的深情追忆中,诗人说,“去寻找生命的激流,去寻找悲壮的飞浪/去寻找龙鳞金甲的祥光。”^⑤维吾尔族作家阿娜尔古丽的《青春的边界》《在冰上行走的鱼》《伤心的网事》《盐湖囚徒》《大风起兮话草原》等作品无一例外地书写了魂牵梦萦的“家园”。“家园”在这里成了融入作家个人情感和灵魂依恋的诗意栖居空间,是想象中未曾被现代都市污染的纯粹净土。哈萨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维吾尔族作家麦提敏·阿卜力孜,黎族作家李其文,蒙古族作家

① 乌热尔图:《老人与鹿》,《上海文学》1981 年第 8 期。

② 查黑尔·特木日:《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民族文学》2010 年第 4 期。

③ 周静:《往事飘过河流》,《民族文学》2010 年第 4 期。

④ 杜李:《鄂西,鄂西》,《乡歌,梦里的老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 1 页。

桑杰、照日格图、苏笑嫣、木琮尔、陈萨日娜,壮族作家潘小楼,瑶族作家甘应鑫,土家族作家陈克海等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表达了对本民族历史的深情记忆,甚至不惜以浪漫化与神圣化民族历史的方式达到族群身份的执着构拟,叙述声音也非汉族80后文学的愤激、戏谑、油滑、叛逆与反讽,而是严肃、忧思、深沉与理性。

底层 / 边缘命运的执着叩问

在现代性这一“巨型寓言”力图将各边缘或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同质化、单一性的知识谱系面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灾害、资源枯竭、传统生计方式解体等问题愈演愈烈。在这一过程中,即使少数民族群体能够走出本族群生活场域而远赴他处寻求生存之道,由于自身不掌握相应的技术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而使其仍然处于或心理或身体的边缘位置,生存的艰难与无以为家的焦虑所造成的“贫穷文化”会以一种强烈而持久的心里创伤留存于记忆深处。因为,少数民族80后作家大多有较长时期的苦难而贫瘠的底层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尽管他们或已在城市定居或工作、或求学于城市,但乡村生活的贫困与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风险以一种无意识形式作用于他们的创作。这一源自生命深处的贫穷文化记忆使他们一再致力于底层命运的执着叩问,并作为一种民族认同方式参与着公共性话语的建构。

回族80后作家马金莲一直生活于“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自身历经坎坷与其生存环境恶劣的双重视域形塑了她的苦难体验与自觉的底层书写意识,她的底层书写在少数民族80后作家中也极具典型性。她的《父亲的雪》《夜空》《柳叶哨》《老人与窑》《赛麦的院子》《尕师兄》等作品都是以直抵心灵的方式重复着苦难或贫穷的主题,在对“忙不完的农事”以及这一氛围中形成的回族人物性格与精神心态的揭示中表现出底层社会问题的沉重。《赛麦的院子》中的“母亲”“永远都在忙。”就是这样一个“永远都在忙”的女人因“一排溜儿生了七个,全是女子”而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母亲也为此对自己有了不满和怨恨。^①尽管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个中国都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进程之中,但民族传统以及在传统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与道德伦理仍然以一种隐而不彰的方式作用于少数民族群体,“母亲”及其遭遇无疑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征。彝族作家李其文的《游在河里的啤酒瓶》《没有什么比一场雨来得突然》《肚子》等通过对底层小人物最终或死亡或流浪的触目惊心的描写,揭示了底层人物的无知、麻木和无奈,甚至是绝望的生存状态;土家族作家陈克海的《拼居》《都是因为我们穷》等作品也是诠释着在道德沦丧、真爱匮乏、欲壑难填的平面化社会里,底层人物的无力、无助与无望。

^① 马金莲:《赛麦的院子》,《民族文学》2010年第9期。

作为现代性的典型表征,城市化在以不可阻挡之势快速冲击着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传统观念、价值伦理、道德信仰等,这一现代性风险不能不使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体验到“伤口”般的疼痛,回族诗人廖淮光就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结果隐喻为“一道伤口”：“一条路,看上去就不太像路了/像村庄的一道伤口。”^①既然“故乡”已成了“伤口”,少数民族群体不得不背井离乡,远去城市打工。然而,作为在现代性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群体因不掌握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本而只能靠体力从事一些低收入、简单化的生产劳动,他们很难在城市生活中生成一种“家”的感觉而不得不处于“边缘”位置。“异乡人”这一典型的他者身份形象化揭示出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的身份迷失及其焦虑,而这种迷失及其焦虑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执着于寻找身份的依托和心灵停泊的根源意义上的“家”,“乡关在何处?/你孤单地站在夜的花蕾之上/眸光的湖心,依然是英华一片/这是一场温柔的洗劫啊/我瞬间疼成了你眼角的一滴泪”^②。在这里,诗人如同一只黄昏中找不到归宿的鸟而只有不停地寻找着归家的路。“何处是归途”对他们而言既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题,也是心中一个永远难以治愈的伤痛。所以,他们都难以知道“哪一种更幸运/是老死故乡,还是湮没在远方/风依然在吹,一棵树的孤独越来越锋利如刀”^③。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城市里,“一颗树”既是孤独的,也是脆弱的,更是缺乏认同感的,由此造成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及精神压力以及由这种压力所激发出的对往日乡土记忆的情感体验以空前剧烈的强度扩散、漫漶开来。问题的吊诡在于,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基因与民族记忆使得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难以在城市安“家”,能够作为“家”的民族传统与文化根基又在现代性冲击下面目全非,“乡关在何处”成为他们无法找到答案的困惑。^④“在而不属于”的边缘体验使得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的底层书写是一种融入了生命体验后的伤痛或苦难,尽管当前一些 80 后作家也关注底层,关注底层的苦难或伤痛,他们笔下的伤痛或苦难大多是在温暖的书房里仅凭主观臆想而建构或预设出的疼痛,是对苦难或泪水的故意堆积或文学虚构,以弥补叙述的浅薄和文学意蕴的浅显,甚至是以此为“噱头”来博得读者的怜悯,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中的伤痛则是经过作家灵魂转化和心灵浸染的伤痛,是对伤痛的艺术升华或审美转化。壮族作家潘小楼的《小满》,蒙古族作家木琮尔的《雏凤清声》《为谁活着》,陈萨日娜的《情缘》,鲍尔金娜的《紫茗红

① 廖淮光:《村庄的路》,《民族文学》2012 年第 4 期。

② 陈德根:《城市幻想曲》,《城市边缘》,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年,第 6 页。

③ 廖淮光:《一棵争吵的树》,《时光的路上(组诗)》,《民族文学》2012 年第 4 期。

④ 一个典型的话语症候是,蒙古族作家苏笑嫣的《外省娃娃》是一篇关于北京女孩的故事,但其题目本身就表征着少数民族在城市中“在而不属于”意义上的流散体验。与之不同的是,北京女孩 80 后汉族作家春树的《北京娃娃》同样是书写北京女孩的故事,作品题目本身表述的却是北京女孩的“家园”意识。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对城市的态度略见一斑。

菱》，马金莲的《老人与窑》《赛麦的院子》等对底层伤痛的讲述无不如此。

在当前“私人化”、“欲望化”、“虚无化”、“娱乐化”写作甚嚣尘上的“小时代”或“我时代”，少数民族80后作家执着于底层生活的诗性观照，表现出对民族、社会与现实问题的严峻关切和责任担当意识，这是与一些汉族80后作家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源于少数民族80后作家大多经历过从边缘区域进入现代都市或城市的生命体验与苦难记忆，他们的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使得他们的创作往往潜隐着乡土情结而使之自然而然的关注着底层民众，他们不得不把笔触伸及底层生活而借此寻找精神救赎。少数民族80后文学的底层写作也就丰富了当下“底层写作”的思想容量和艺术元素，提升了“底层写作”的审美品格和精神境界。

青春 / 成长体验的多维探索

从表面上看，少数民族80后作家也常常书写青春期的苦闷或孤寂，甚至也流露出青春期特有的叛逆或颠覆行为，但先验性的边缘意识与族群认同使得他们的个体叙事规避了平面化、叛逆性的小众意义上的叙事伦理，个体与民族、传统与现代、主流与边缘之间的内在张力使得少数民族80后文学更多表述着青春期特有的迷惘之后的反思，消沉之后的奋起，这是少数民族80后文学和汉族80后文学关于“青春书写”的根本差别。达斡尔族作家晶达曾说，“虽然我写的可能会有暗黑的感觉，但希望读者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正能量’。”^①“穿青人”诗人徐源在《一转身，我们便会拥有这世界》组诗中把他们的文学主题看作是“永不会退缩”^②。“永不退缩”既是少数民族80后作家共同的生命呼唤和灵魂诉说，也是少数民族80后作家渴望以自身特有方式参与社会对话的隐性书写。所以，少数民族80后文学的青春书写就不止于以展示或叙述青春期的反叛、孤寂、迷惘或“负文化”为目的，没有或主要不是以所谓的“‘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他们书写的是个体生命在各种有形无形的‘门’与‘网’中无可皈依的荒谬性的存在困境。他们的创作是对既存秩序和存在方式的怀疑、背离、反叛和解构。”^③“成长”或“独立”成为少数民族80后文学主题。

蒙古族作家木琮尔的《雏凤清声》无疑是这一书写的典型文本。《雏凤清声》主人公夏麦不满意自己的现状，不满意母亲林木为自己安排的一切，更不满意母亲给她介绍的男朋友而

① 晶达：《我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散发“正能量”的人》，《中国民族》2013年第2期。

② 转引自卢山、赵卫峰《出自灵魂孤独的声音——新世纪以来80后少数民族诗人诗歌流域图》，《中国诗人》2013年第4卷。

③ 郭彩侠、刘成才：《一代人的写作伦理——80后作家的美学症候与精神叙事轨迹》，《文艺争鸣》2011年第6期。

搬到外面去住,“不过这回我终于想明白了,继续再生活在父母的身边就永远无法自己做主,失去独立思考和判断抉择的权利。精神的独立必须先从自己过开始!”^①“需要自己的生活”成为少数民族 80 后一代成长故事的经典表达。维吾尔族作家阿依木尼莎·苏莱曼的《心灵的闪光》中也有这样的表述:“向别人乞讨的生活不应该属于你。你若想靠近人生的神圣,生活的路你应该自己走。”^②

尽管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也敏锐触及到了严峻的就业问题,并真实再现了 80 后在求学、就业等阶段的逃学、酗酒、打架、游戏人生、消极逃遁等这一代人独有的对抗现实的各种负面行为。不过,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对他们成长路径与方式的探索却超越了对各种负面行为的描写。或者说,他们正是在少数民族 80 后一代各种负面行为的描写中窥视到了 80 后一代如何成长的问题。蒙古族作家陈萨日娜的《情缘》中的叙述者“我”在大学四年刻苦学习,毕业后却“到处碰壁”,在经历过思想上的偏激和行为上的放纵之后,“我”还是回到山村当一名代课教师,不亢不卑、不恋浮华、不慕富贵,最终凭自己的勤劳、知识、能力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收获一份真挚的爱情。^③壮族作家甘应鑫的《想飞》《无羽之鸟》《回来》,蒙古族作家赵吉雅的《片片枫叶情》《伊尔法的日记》,满族作家张牧笛的《印象里所有的夏天》,康琬欣的《又见初夏》《青春的边界》《走出抑郁》《变色的梦幻》等也都是以大学生的求职、失业、挣扎以及最后的成长为主题,探讨了 80 后一代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我要的是前途”式的成长历程。就此意义而言,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是在个人与公共历史的互动关系中建构着公共性言说范式,他们对青春故事的文学书写其实融入了对时代、历史、民族、独立、成长等当下问题以及对同龄人共同情感体验与命运的思考之中,他们对世俗本能的自觉反思,对现实处境的冷静判断,对民族存续的焦灼忧思,对未来前途的探寻期许等宏大叙事的伦理取向,使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的青春书写彰显出沉重的价值探寻或道德重塑的愿景。

开拓 / 局限中的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

与汉族 80 后文学更多表现出泛审美时代的反叛与虚无不同,沉潜在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身上的民族基因和民族文化密码使得他们的文学呈现出典型的寓言性书写。尽管他们的作品对极具民族特点和地域风情的草原、沙漠、河流、游牧、民俗、风物等的描写不如他们的父辈作家那么集中和丰富,也不善于以民族志方式展现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不过,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深层结构上影响着他们的美学选择与主题表述。自称“城市里流泪的狮

① 木琮尔:《雏凤清声》,《民族文学》2011 年第 8 期。

② 阿依木尼莎·苏莱曼:《心灵的闪光》,《民族文学》2010 年第 4 期。

③ 陈萨日娜:《情缘》,《民族文学》2010 年第 4 期。

子”的田冯太说,“虽然我从小就离开故乡,但我坚信自己体内流的是土家人的血,这种超越的理念在我未出生前就已经植根于我的体内了。”^①正是因为有了羌族历史与文化的遗传,羌族作家羌人六特意在笔名中标上了“羌人”。但是,作为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新世纪大学生,他又能够超越狭隘的、文化保护主义意义上的民族性书写,而使自己的作品触及“大我”的灵魂深处,表现出典型的社会公共性书写特征。他说,“我要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写作。”^②在社会公共性问题的审美言说中杂糅着民族性文化基因,在民族性建构中积极思考社会公共性命题,既是少数民族80后文学书写的价值论命题,亦是少数民族80后“这一代”作家在全球化及多元化语境下寻求建构性身份认同的目的论动因。所以,他们的作品一般不参与80后文学“类型小说”的写作^③,也主要不是借助现代新媒介等的炒作取得成功,亦不是沉溺于“小我”的顾盼自怜和自怨自艾,而是以对社会、民族、历史、人生等社会问题的执着探索而赢得关注。

当我们在评价80后作家作品时,总是谈到80后作家的人生体验较浅、生命经验不足、创作历程较短、文化积淀较少等问题,少数民族80后作家依然面临着这一问题的羁绊。尽管他们背靠着丰富的极富地域与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资源(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下,这一审美文化资源的潜在意义将会愈加凸显),并能够对之加以现代性意义上的转型与升华,同时又能够及时汲取各种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创作观念及文学创作手法,特别是新媒体叙述艺术的普遍采用,建构出一种与其他族群文学及普世性文学能够优势互补和互文对话的审美平台,从而使自身的文学表征具有意义增值的开放性。不过,总体看来,少数民族80后文学还缺乏大的境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现代技巧的圆熟来取代文学思想内容的锤炼和理性审视,故事编造的痕迹过于明显,情节的设置过于斧凿,问题的解决过于随意,经不起推敲,不符合情节的逻辑发展,甚至有的作品还停留在学生作文的水平。特别是个别作家在成名之后便很快形成了固有的写作套路和模式,并以之为创作成功的秘诀,后续作品很难再有突破而沦为复制性写作,这是少数民族80后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少数民族80后作家作为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一代,他们的创作应如初春的朝阳,待放的蓓蕾,出土的幼苗,蕴涵着无限的潜能与希望,无限的丰富与可能。但是,当前一些少数民族80后文学在叙事节奏、艺术手法、话语表述等方面却刻意装扮成饱经沧桑的老人,故作老成、老练和老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探索的勇气、开拓的热情和创新的胆识;再者,少数民族80后作家还缺

① 田冯太:《专写“下等人”的生活》,《中国民族报》2010年5月28日。

② 羌人六:《面向世界的写作来源》,《中国民族报》2010年5月28日。

③ 80后作家几乎都从事(着)过类型小说创作,如武侠小说、仙侠小说、玄幻小说、穿越小说、悬疑小说、推理小说、架空历史小说、神话小说、盗墓小说、后宫小说、耽美小说、恐怖小说等。

乏一种最大限度抵达和还原生活原貌、人生经验并能够对之加以典型化概括及审美转化的能力,对现实生活秩序和人生体验把握的无力与无奈(或不屑把握),最终只有靠随心所欲的虚构与想象来填充内容的苍白。这里的虚构与想象亦非文学意义上的而只是一种脱离生活体验和生命经验的假大空,“经验不够超验(如玄幻、灵异等)来凑”成为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的突出特点,他们的创作甚至还只是自己日常生活或情感体验的简单转借,而非出自灵魂体验的超验性写作。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要想成为一种独特的代际写作现象,还有许多的问题要注意。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批评的缺席或匮乏,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们的健康成长。

从当前一些较有代表性的 80 后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及其文学问题依然没有引起注意,即使是出版商、媒体或网络等也都表现出对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的集体冷漠与不屑。其一,此举彰显出批评界对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及其文学的不负责态度;其二,表现出批评者自身学术素养及审美概括能力的缺失。这种缺失与当前较为活跃的批评者与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的代际差异所带来的审美感受力的不同有关,也与少数民族 80 后批评者自身还没有真正在批评界取得较大的话语权有关,导致学界对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批评表现出态度的傲慢与居高临下的批评姿态。即使有些研究触及到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问题也只是将目光集中于这一文学背后的文化市场与消费这一“逻各斯”,而不是从文学的本体层面去探讨少数民族 80 后文学的文学史意义。特别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语境下,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已渐趋表现出认同的多重性与审美的现代性,他们的创作也越来越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或艺术形态。例如,很多在以汉族文化主导的城市里长大的少数民族第二代、第三代作家,他们作品中的民族性因素如何体现、与汉族 80 后作家相比他们的创作优势何在、如何参与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对话与竞争等问题,亟需学界真正从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出发,阐释其成就与不足,引导其创作,丰富其内涵,补充或充实中国文坛的新鲜血液。这一点,对少数民族 80 后作家的成长及其文学的成熟来说,至关重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项目编号:13FZW034)的阶段性成果

(李长中,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翔】